



讲述

秘运黄金,为周公馆提供经费

1945年9月,石英调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兼省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其间,中共代表团的刘恕曾去山东找到石英,他们商定继续从山东运花生油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运回山东,以供解放区的需要。

花生油由山东石岛用船运至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同时他们还约定,山东解放区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也随船运到上海,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所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解放区上缴中央的经费。

为了保密,黄金、美钞和法币都是藏在花生油桶内运到上海的,到上海后都交给华益公司处理。华益公司是中共代表团的钱之光派肖林到上海建立的一个地下经济机构,该公司对外做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中共代表团经营一些经费。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黄金和美钞则需要到市场上出售。但因山东来的黄金上印有“烟台”字样,不便上市,所以就请一位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把那些黄金加工成上海规格,打上上海标记后再出售。经过这些处理后,钱款记入中共代表团账内,供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

大战之前,确保食品送到部队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24个师、45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我鲁中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一死战。此时我军在淄博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准备发起新的战役。

为了适应大兵团连续流动作战的需要,华东野战军成立了供应总站,负责野战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近40万人的副食品供应。当供应总站副站长范征夫找到石英要求支援时,石英当即表示,工商总局已经在干部中传达了华东局关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示,并做好了准备,坚决保证野战军的副食品供应。

在谈到具体供应办法时,石英说,今后只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写个公函,说明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盖上公章,我们各地工商局即可照发,以后再行结算。同时为了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还派了一位专区工商局的赵局长到供应总站共同办公。后来事实证明,部队的同志只要拿了供应总站或分站、支站的公函,到当地工商局联系,基本上都能及时领到部队所需的副食品。

1947年5月初,孟良崮战役前,为了给部队紧急筹集副食品供应,范征夫又找到石英。石英听了情况后,马上答应以工商总局的名义向山东省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及各区的工商部门,尽快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5万斤、食盐1万斤、花生米50万斤、鱼干15万斤,还有大豆、粉丝、干菜各数万斤。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副食品,在战前都及时运到了作战部队指定的地点,对改善部队伙食、保证战役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跃进”中,讲数量更要讲质量

石英于1955年初调入上海工作,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办公室(四办)主任,主要负责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公私合营工作。1957年,四办撤销,一轻局和二轻局合并成上海市轻工业局,石英出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当时公私合营刚结束,一批私营工厂转为公私合营还不久,企业分散,设备简陋,特别是有些行业和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而不久“大跃进”兴起,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轻工业的发展不可能从国家获得必要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石英只能利用局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特别是充分发挥上海轻工业系统中一批能工巧匠的作用,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比如利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利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工业,利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利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等。

石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填补产品空白上。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石英亲自抓了手表、照相机、感光材料、合成洗衣粉、高级金笔、高级香烟、公路赛车、光学玻璃、石英玻璃、人造宝石等十大重点产品,以及为首都十大建设工程配套的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石英除了定期开会听汇报、检查进度外,还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到第一线去办公。

比如为了让“红双喜”乒乓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几个月时间中,石英深入工厂不下几十次,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去,有时晚上11点钟还在车间现场。“红双喜”乒乓球的质量终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那天,石英特别高兴,晚上一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母亲。几天后,他还特地买了两块“红双喜”乒乓球拍和六个乒乓球给我,作为纪念。在手表厂检查工作时,当他发现手表虽然试出了样品,但过不了大生产的关,就马上派人去北京请示有关部门,请来外国专家帮助解决了大生产中的技术难关。经过石英和上海轻工业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年努力,十大重点产品和50多万件精密产品都圆满完成,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上海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本文首发于《上海滩》杂志,转载自《新民晚报》)

遇见梵高

沈云霞

丰富!观看原作的好处就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画家的笔触线条。天空的笔触是横竖交错的短线条,海水的笔法是横向的短线条,近景的沙滩则是倾斜的短线。在我看来,整幅画的色调是冷的,梵高用这种冷表达着他的艺术风格不被接受的孤寂与焦虑。尽管如此,他依然用燃烧自己生命的方式不断创作,直到最后一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参观

时正遇上梵高在圣雷米最后阶段画作展。越到晚期,梵高的创作欲望更强烈,用色也越来越亮,呈现出明朗的画风。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他的喜悦。这或许就是他作为画家生命最后的境界吧,极致绚烂后终归静美。1890年7月29日,画家在他弟弟提奥怀中去世。

奥赛博物馆的珍宝太多了,许多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家名作珍藏在此。莫奈的《虞美人》《睡莲》,雷诺阿的《加莱特磨坊的舞会》等。这里是艺术教育的圣殿,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排队入馆的队伍绵延几百米。我们特意买了贵宾票才免了排队的等候。为艺术而多掏钱是值得的。

从博物馆出来后和吴严聊天,他说他女儿小时候在欧洲时,他总是带她到各处的艺术博物馆参观。孩子其实并不是特别乐意的,他不管,就是要求她必须去。他相信这种无意识的熏陶终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出来,后来果真如此。我深以为然。美育塑造人的灵魂。

身在巴黎是幸福的,这里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博物馆、画廊遍地都是,连街边门脸的卷闸门上都是各种艺术涂鸦。巴黎人是不允许有一块空墙的。艺术教育不就应该如此吗?由俗入雅,由雅而返俗,如此,人的素养怎会不提高呢?



读老书

张岱

我公公(即爷爷)出生在清宣统三年,即辛亥革命那年。家里实在穷,靠租种地主家三亩田,及我曾祖父挑担游走乡里收荒货养活家里五口人,常常饱一餐饿一餐。我公公八岁时,曾祖父认为家里不发达就是因无读书子,一屋的“光眼瞎子”,一咬牙交了一担米到芍药塘李家私塾,让公公去读老书。

读老书有读老书的规矩。

首先是读书知礼仪。放学路上休跑跳,免得旁人说先生。每天到学堂,先要对孔子牌位作揖行礼,对先生要鞠躬行礼如仪,见到同学要互相问好。

二是摇头晃脑,死记呆背。启蒙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先生每天念一段,学生跟着念。不管懂意思还是不懂意思,须背得滚瓜烂熟。先生看书读得熟不熟,就是不时抽查,点名:“某伢子,你站起来。”这时学生就要起立,恭恭敬敬走到先生身边站好,由先生翻书翻书到某页,然后指其中一段要学生背。学生瞄一眼书后便扯起喉咙,不“打咽插”,一字、一句不漏,流畅地背出来。若是支支吾吾、抓耳挠腮,先生会骂:“你咯只蠢家伙,猪都教熟了,连猪都不如。”边骂,边顺手操起戒尺拿着学生摊开的手掌,“啪、啪、啪”就是三响,打得手板通红、麻辣火烧。回家后,家长见儿子挨了打,反而说先生打得好,要求严,细伢子不打不成器。

三是写字,横平竖直,坐姿端正。写方方正正字,作堂堂正正人,字不得歪七扭八。那时写字是用石板、石笔。石板就是用青石磨平,两厘米厚,32开书大小,顶部

钻两个孔,用麻绳串起来,做个提手。石笔是用滑石加工而成,写在石板上成灰黄、灰白色。石板擦用烂布条做成,高4厘米,直径3厘米的圆柱。有时也用布直接擦,沾点水或者涂上口水,擦起来既省力又干净。有时直接用手或袖口去擦,时间一长,袖口就乌黑锃亮。

四是对对子,这就是看细伢子书读进去了不。我公公那时“作古正经”像个读书郎的,就是平时不猫弹鬼跳。衣衫虽旧却干干净净,不像乡里野伢子一身邋遢死的。乡里野伢子歇不得气,不是上树捉鸟,就是下河捞鱼。我公公连看牛都拿着《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去背,把“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当“白口俚子”唱。对起对联来也是伢子作揖,起手不难。这天,先生出联:“三担谷”。我公公答:“六钧弓”。先生继续说:“三担谷养懒汉”。我公公答:“六钧弓出英雄。”先生又说:“三担谷养懒汉,非长久之计。”我公公答:“六钧弓出英雄,实社稷其才。”对答得“一溜溜”。李先生左手执书,右手捋须,微微颌首:“此子可造。”

家里无余钱剩米,养一个读书郎实在是捉襟见肘,勉为其难。

一是中午带饭没什么可带。古人说:“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爹有新诗上相公。”是那时真实的写照。那时竹饭箩里多数时间盛的是两个蒸熟的红薯。好不容易可带一餐白米饭,不懂事的妹妹还要用饭瓢从碗中舀一瓢出来,理由是我们做事的还没有饱饭吃,读书的不做事还要吃一碗饭,没有这个道理。

二是那时纸金贵。很少用纸写字,即算用也用的是黄色毛边纸。那时的人认为敬惜字纸功德甚大,认为文字是神圣和崇高的,写在纸上的文字,不能随意亵渎。即使

是废字、废纸,也必须诚心敬意地烧掉。“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惜字塔始于宋代,到元、明、清已经相当普及。通常建造于场镇街口、书院寺庙之内、道路桥梁旁边。有些大户人家亦在自家院内建有惜字塔。惜字塔,亦称为惜字塔、惜字楼、焚字库、焚纸楼。台湾称圣迹亭,四川称文峰塔,客家称敬字亭。惜字塔是烧毁书和有文字的纸张的地方,是古人敬惜字纸理念的体现。那时的人见地上有遗弃的字纸,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也要设法捞取用水洗净,或候烘晒干了,再投入惜字楼用火焚烧。受此影响,私塾边上就有个惜字塔。如果写有字的废纸不放进惜字塔内烧掉,或看见地上有废纸不捡拾,让先生看见了,轻则是一顿好骂,重则是脑壳上享用几下“栗壳蹦”。

终于读了一年书,家中再无钱供养。这天,我公公用饭箩带上一条小腊肉到私塾,恭恭敬敬来跟老师告别。李老师半晌没有言语,一声长叹:“这个细伢子,可惜了,可惜了。”在家放牛扯猪菜,帮大人插田扮禾三年后,我公公就被曾祖父送到湘潭十八总周家篴铺当学徒。这之后便是做工养家、当兵抗日,光复后回归湘潭,几十年风风雨雨,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勤有功,嬉无益”是他的座右铭、口头禅。

他临终时,我们清理他的遗物,见一个小木匣内保存了他上私塾的一本《三字经》和一张发脆的黄色毛边纸,上书他写的“学则不愚”四个楷书字。见此如闪电般,他老年时戴着老花镜在煤油灯下看《毛泽东选集》时的画面一下就掠过我的脑海。我的双眼流泪。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读书梦,他老人家坚守了一辈子。现在我也快退休了,每当读书倦怠时,想起公公艰辛的求学历程,不由得“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有书可谈,于社会、于人生还奢求什么呢?